

外国人眼中的 蒋介石和宋美龄

(下)

岳渭仁 冬 卉
向东华 晓 晴
编

三秦出版社



外国人眼中的 蒋介石和宋美龄

(下)

岳渭仁 冬 卉 编
向东华 晓 晴

三秦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05

外国人眼中的蒋介石和宋美龄

岳渭仁 冬卉 向东华 晓晴 编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12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广播电视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8.5印张 400千字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80546-784-6/K·222

定价:13.80元(上、下册)

目 录

抗战初期,蒋介石夫妇在武汉	
.....	〔美〕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1)
抗日救亡运动初期的蒋夫人	
.....	〔美〕 埃米莉·哈恩(11)
和蒋氏夫妇相关的一段故事	
.....	〔苏〕 С·П·康斯坦丁诺夫(31)
蒋介石:中国抗战时期政治气温的温度计	
.....	〔美〕 埃德加·斯诺(37)
抗日战争使蒋介石几乎成了半个神	
.....	〔美〕 白修德 贾安娜(43)
蒋介石:亚洲政治中的一个怪人	
.....	〔美〕 白修德(58)
1942年11月—1943年5月·宋美龄在美国	
.....	〔美〕 巴巴拉·塔奇曼(69)
追述:宋美龄在韦尔斯利大学的学习生活	
.....	〔美〕 罗比·尤恩森(76)

- 评国民党的“圣经”——蒋氏著《中国之命运》
〔苏〕 B·B·沃龙佐夫(82)
- 抗日时期,活跃在国民党宣传战线上的蒋夫人
〔美〕 罗比·尤恩森(90)
- 和宋美龄接触印象:骄傲使她在演戏
〔美〕 费正清(101)
- 1944年·有关中国“第一家庭”的谣言流传在重庆
〔美〕 谢伟思(105)
- 蒋介石夫妇和史迪威将军
〔苏〕 B·B·沃龙佐夫(109)
- 蒋氏夫妇在《史迪威日记》中的“留影”
〔美〕 约瑟夫·W·史迪威(129)
- 对蒋介石伉俪的印象评论 ABC
〔美〕 巴巴拉·塔奇曼(135)
- 蒋介石、华莱士和“迪克西使团”
〔美〕 伊·卡恩(143)
- 从“迪克西使团”说到蒋介石的反共历史
〔美〕 戴维·包瑞德(159)
- 1945年,蒋介石和毛泽东相会在重庆
〔美〕 R·特里尔(161)
- 蒋氏夫妇和即将离华返美的马歇尔的几次接触
〔美〕 福雷斯特·C·波格(167)
- 瓦解桂系:蒋介石“分而治之”手段的一面镜子
〔美〕 谢伟思(174)
- 蒋介石和三青团
〔美〕 易劳逸(181)

南京政府倾覆前后的蒋介石

.....〔苏〕 B·B·沃龙佐夫(200)

从权力顶峰跌落下来以后的中国“第一夫人”

.....〔美〕 斯特林·西格雷夫(210)

蒋介石自省:国民党为何垮台

.....〔美〕 易劳逸(219)

闲话蒋介石和宋美龄

.....〔德〕 王安娜(231)

对蒋介石,海伦、卡尔森如是说

.....〔美〕 肯尼思·休梅克(235)

蒋介石晚年在台湾

.....〔美〕 布赖恩·克罗泽(246)

蒋介石:20世纪的历史人物之一

.....〔日〕 岸信介(268)

蒋介石、宋美龄政治形象素描

.....〔美〕 杰克·贝尔登(278)

抗战初期，蒋介石夫妇在武汉

〔美〕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抗日战争时期任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抗战爆发时，卡尔逊第三次来到中国。在此后的18个月里，他对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进行了认真考察，足迹遍及五省。

1940，卡尔逊出版了他的《中国的双星》一书^①。该书所记述的就是作者18个月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游历中国的见闻”，堪称抗战初期中国各个战场的考察“实录”。

下面这段文字摘自该书第五章《台儿庄：中国赢得一次胜利》和第十章《浴血抵抗》。作者记述的，是他在武昌同蒋介石夫妇两次会见和谈话的情况。〕

武汉是对包括汉口、汉阳和武昌三个城市的一大都市区的统称。汉口、汉阳位于长江的北岸，中间隔着汉水，武昌坐落在它们对面的长江南岸。

三月初我回到武汉时，它已成为战时的首都。政府部门

^① 《中国的双星》，祁国明、汪杉译，汪溪校，新华出版社1987年出版。

的办公室，蒋总司令的军事指挥部和外国政府驻中国的大使馆都在这里。

汉口是外国租界所在地，当时只有法国还确实有个租界，日本的租界已被中国人接管，前英国和俄国的租界地也已成了特别行政区。外国使馆、商行和许多中国政府的办事机构都设在汉口。

兵工厂是汉阳最重要的特征，虽然还有其它工厂和贫民区。武昌是蒋总司令的司令部，也有几个外国使馆和若干所大学。武昌是广州向北延伸的一条铁路的终点站。现在中国的大部分进口军用物资是通过这条铁路运进来的。

.....

一天，董显光博士，能干的公共关系部副部长引我去见蒋介石夫妇。他被报界同行亲热地称为霍利，从美国一所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编辑、出版报纸。他是蒋委员长信赖的朋友，于1937年写完了蒋的传记。

我们渡江到武昌，驱车来到这对卓越的夫妇居住的摆设简朴的公馆。从1929年南京孙中山博士的葬礼之后，我没有见过他们，不知岁月和重担会使他们有多大改变。

不一会儿，外屋响起了短促、有力的脚步声，蒋夫人后面跟着腰板笔直的蒋委员长走进来了。

蒋夫人相当妩媚动人，但不是青年人轻浮的妩媚，虽然她也挺活泼。这是一种内心的恬静和意识到受命运主宰，要为人民尽责产生的成熟的端庄优雅。

他们高兴地欢迎我。蒋夫人在我摆开地图的桌子前坐了下来。蒋委员长仍旧站着，直到夫人提醒他坐下。她转向我解释道：“委员长的背部在西安受伤后一直没好，他不宜久

站。”

我审视着这位在过去十年中主宰着中国命运的人物。他比我上次见到他时苍老多了，剪得短短的头发正在变成灰白色，但是他增添了泰然自若和自信，也更老练更成熟了。他明亮的黑眼睛几乎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他的眼睛里有智慧、忠诚和坚定的决断。

我用一个小时叙述了在北方的经历，回答了他们尖锐的提问。我向他表示，我相信八路军的领导人对蒋委员长是忠诚的，我描述了他们在日本人战线后方实行代议制政府所采取的步骤，我说我感到五台山地区人民的抵抗意志是我所见到过的最顽强的，而且他们合作得也好些，这时，委员长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回答道：“我认为那是由于他们完全被日本人包围了，他们面临的共同危难使他们丢弃某些个人的考虑而团结合作，领导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大大地鼓舞了他们。”

蒋的脸上没有露出他对这个观点的反应。事实上，委员长的脸可以不夸张地说是捉摸不透的。威仪堂堂的镇定自若是他领导成功的原因之一——另一个是他极端的自信。他政治上是狡黠的，通过信守他实现的少数诺言，为自己树立了强有力的诚笃正直的形象。他的不可捉摸给每个政治集团造成一种印象，他私下里是同情自己这个集团的主张的。

一个小时后他们站起来要走了，我请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签名，他谦和地默许了。他用的是一支红蓝铅笔，拿好姿势刚要写，看到向下的是红铅，赶快把笔倒过来，用蓝铅写，这是一瞬间的事，但含意颇多。

.....

董显光依然领导着公共关系部的工作，有一天，他带我去拜访总司令。这次会见两天前就已排上日程，但是总司令的私人住所一次轰炸中被波及，会见延期了。这次轰炸大概是蒋在这场战争中最接近死亡的一次，尽管他常去前线视察。一颗炸弹捎着了总司令和夫人的防空洞，另一些炸中了他的保镖的住所，死了几个人。

总司令看来疲惫不堪，头发比三月间更灰白了，不过他精神极好，信心十足。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倾听我对旅行的描述，偶尔插话，加以评论或提问。毛泽东曾向我讲过共产党对战后的设想，我特别希望知道蒋的反应。我把这些设想告诉他之后，问他：“他们的意见与你的一样吗？”他简单地回答说：“差不多。”

当时和以后一些场合我都极力猜测中国这位强者的动机和信念。他自己生活简单是没有问题的。他希望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时，为了挽救他的国家甘愿牺牲生命也是无疑的。那么，为什么他不能在自己政党的下属中更有力地清除效率低和自私自利的弊病呢？又为什么不愿意使用在北面敌后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去动员人民呢？

我分析大概有三个主要原因。在中国蒋总司令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说服和强制，但在民族危难的关头，他的作用在于把所有的派系都捏在一起。即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许多派系。

其次，他非常重视下属忠诚，总是充分地给以回报，有时不利于自己也在所不惜。在他的部属中有些曾是有干劲、无偏见、有效率的，现在变得自鸣得意、思想保守了。对这些人他不愿严加处理。

最后，在国民党队伍中，很多官员是按独裁主义的传统提拔上来的。他们信奉等级传统，认为上层等级理应享受广大人民群众得不到的特权和额外收入。有权才能保住这些。如果老百姓被动员了起来，对这些人所管理的事务有发言权，这些自私自利的官吏就会丢掉官职和特权。改变这些已经牢固地形成的思想模式是要时日的。总司令想通过说服和树立榜样改变这些思想模式，但进展迟缓。

1938年复活节前夕，他在对中国人民的广播讲话中说：“凡是从事民族革命的人，莫不先将社会的黑暗、颓废、紊乱、私心、贪污铲除殆尽，然后以新的精神来创造新的生活，使之充实发展向上，来求民族的解放。”

总司令对战争有信心。他正在利用时间，利用中国的人力和广阔的领土与日本人的现代军事武器和速胜的企图作斗争。战争的第一阶段，他指示他的将领们要尽最大努力抵抗敌人的进攻，但是当他们被迫撤退时，也要沿着他指定的路线撤出。事实上，上海、徐州和汉口战役不过是拖延战术，以此来争取必要的时间建立深入内地的根据地，那里地形崎岖，敌人难于攻陷。这样，也争取了时间对老百姓进行更充分的民族主义精神教育，鼓舞他们顶住敌人的控制，使那些最终被迫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一些时日的人有可能继续为最终胜利做秘密工作。汉口沦陷，第一阶段即将结束，因为那时中国军队将处于西藏高原脚下的中心位置，难以驱逐敌人，而日本人将为驻守很长的交通线，为在1500英里的战线上保持外线地位消耗他们的兵力。

战争将进入第二阶段，或游击战的阶段。这时的主要问题将是防止日本用政治手段控制已占领的地区，不让他们掠

夺中国的自然资源，尽量使他们难于沿交通线运输给养。这意味着破坏任何可能形成的傀儡政府的权威，加强人们的抗战意志以削弱傀儡政府的权力。这也意味着大规模地开展游击活动，对日本占领军至关重要的所有据点经常施加压力，阻止日本人掠夺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日本在中国的全部冒险的代价将是极高昂的。

当然，第二阶段观念的基础是坚信在持久战中，中国在经济上能比日本支持久些。维持日本军队需要更多的花费，因为它的全部供给，包括食品，都得从日本本土运来。日本兵不喜欢吃中国的小米、白菜、豆腐、黄豆之类的饭食，愿意吃国内的大米、鱼和牛肉。此外，日本军队是按正统的西方方法建立和训练的，需要重武器装备，要求大炮和飞机助战，这就使它在行军时笨重，维持它费用昂贵。日本人性格固执，很难改变其方法。

另一方面，中国军队在自己本土作战，可更容易更便宜地得到给养，这是有利因素。他们习惯于携轻便武器快速行军，是在友好的老百姓中间活动，在游击战中他们可以选择作战的时间和地点。中国人民习惯于在只能维持生存的条件下生活，他们受到保卫国家独立的精神的激励，准备做出更大的牺牲。中国缺少生产作战物资必需的重工业，但有非常丰富的原材料。中国有着更为重要的东西：热爱自由的世界各族人民的道义支持，这是日本的掠夺性战争所得不到的。

当然，还要有第三阶段，因为游击战争不是决定性的。第三阶段是反攻阶段。当日本人由于本土经济力量枯竭或在中国的交通线上受到难以承受的压力，或二者兼有之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始向沿海撤退时，中国将发动反攻。反攻需要有打

击力量强大、训练有素的部队，蒋总司令已计划在西部和西南的省份进行这样的训练，正如他已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具有通往缅甸、印度支那和苏联的交通线的根据地。

所有这些计划主要地要依靠中国的长期团结。在某些私自利利的国民党军队官员和八路军下级干部中发生过一些摩擦。不过，我过去感觉到、现在依然认为蒋总司令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是相互信任的。双方的心里都装着国家的利益。二者都认识到联合起来的、受到思想教育的民众其精神的和物质的价值。两者的目标都是成立代议制政府。不过，资产阶级官吏的头脑只能逐步接受这种思想。民族危难益深，他们的抵触即会减少。

也可以考察蒋总司令性格的另一侧面。对他信仰基督教是否真诚有一些推测。有一种说法，他皈依基督教是想赢得外国传教士支持的一种狡黠行动，另一说，是为了服从他的虔诚的基督教妻子。两者都与蒋总司令一贯的诚实的名声相矛盾。

众人皆知，他初次求婚时，他现在的妻子的母亲宋夫人要求把信奉基督教作为先决条件。据说，他答称，他将乐于研究基督教，但他不能为了娶爱恋的女人就虔诚地宣誓信奉他还不相信的教义。这是一个正在罕有的热恋中的男人的回答。

不，我确信，蒋总司令信教的真诚是无疑的。1936年12月他在西安被扣留时，他要求的唯一的书就是《圣经》。我后来在这里同他和他的夫人共进午餐时，饭前很自然地进行了一分钟的默祷。

可能耶稣生活的革命方面最使他感兴趣，如果这样，他

就抓住了这种精神的基础的观念。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的这段话是有意义的：“我长久地探寻，想知道耶稣革命精神的来由，什么是它的源泉？我开始认识到它完全来自爱的精神。他清除了人的一切污浊思想，击溃了不平等的制度，使所有的人享有上帝赋予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我无意将总司令的基督教的信仰和他在内战期间使数千信仰共产主义的人遭杀害的行动统一起来。我只想指出，一代一代相传，人们对基督教的学说有了不同的解释。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有一些声称信仰基督教的人在建立事务关系时不考虑博爱，也不考虑怜悯这两个基督教信仰中最强烈的信条。还有一些声称信仰它的基督徒似乎相信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耶稣指定的，谁反对它，他们就狂热地反对谁。或许蒋认为，共产主义是邪恶，只能用非基督教的手段清除之。我认识一些美国传教士，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指责是激烈的、不妥协的。而我却发现，就是这些领导人在不装门面地实践着基督教教义，比我熟悉的那些宣称信仰基督教的人更不拘形式、更持久。有时观念会使人类的脑子产生多么奇怪的事呀！值得注意的是，经历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变得更老练、更人道主义了。

有时人们也会问，蒋总司令是否会在什么时候同意妥协的和平。他的履历和他的公开诺言表明，他不会赞成违背中国主权或领土完整的和平。

1937年12月16日，他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国声明：“中正身为统帅，使国家人民蒙此巨大牺牲，责任所在，无可旁贷，心中痛苦，实十万倍于已死之将士与民众。一息尚存，唯有捐躯顶踵，期以贯彻抗战到底之主旨，求得国家民族最后

之胜利，以报党国，以慰同胞。”以后，他继续重申这个声明的要旨。

.....

对武汉地区的空袭多了起来，现在飞机在较高的空间飞行，通常在一万二到一万五千英尺的高空投弹，比上海战役时的低空轰炸准确度强多了，这说明日本人显然是掌握了一种新式的、改进了的炸弹瞄准器。除了几架高射炮外，中国无力对付这些空袭，因为它的小飞行队受到了严重破坏，必须重建，还要训练新的飞行员。苏联飞机曾在春季和夏季提供了可贵的援助，这时大概因为欧洲吃紧而撤回了。

在这种情况下，汉口上层阶级一帮年轻人的态度有些使我困惑。他们跳舞、玩乐、举行精致的鸡尾酒会和宴会，简直忘记了他们的同胞正为民族生存而战斗。我刚从北方回来，看到过那里的年轻人正做出伟大的个人牺牲，正在从事有关的各项工作，相比之下，真令人震惊。

有一天，我同蒋介石夫人谈起这个对比。我说：“为什么还没有发起一场运动使中国青年认识到他们也应为民族自救做出贡献？似乎是他们起码可做到把日子过得简朴些。”蒋夫人回答：“这正是新生活运动应该做的事。”

因此，我转向新生活运动去寻救答案。

新生活运动作为国家精神动员计划的一部分开始于1934年。有些人说，它是为了减少贪污，促进卫生和健康，注意尊严和仪表整洁，使人们产生精神的动力。

运动围绕着四个字的中国古老美德，即礼、义、廉、耻进行。

“礼”强调人们举止端正，遵守礼节；“义”着重人的职

责，包括广义的服务；“廉”要求正直、廉洁；“耻”告诫人们要培养自尊心，行为不端时要知羞耻。

随着运动的发展，蒋又颁布了八条原则，用作指导行动的具体原则：

△必须清除以往的弊端，建立一个新国家。

△接受为国效力的重任。

△遵守纪律，有信仰，要诚实、谦恭。

△要培养简朴、整洁的衣、食、住、行习惯。

△甘愿吃苦，力求俭朴。

△寻求知识，培养公民的完美道德。

△勇敢、敏捷。

△让我们按照诺言行动起来，最好，不用诺言就行动起来。

从1934年到战争开始的1937年之间，这场运动以巨大的活力席卷全国，并在人们思想中把信奉《八条》与爱国主义和为同日本较量（所有人都知道这种较量有朝一日要到来）所做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准备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个运动没能抓住普通人的心，可能是因为在实行中官员们较多地强调了举止和外表。同时，也因为没有要求官员和富有阶层做出与老百姓所付出的贡献相应的牺牲。

一位著名的外国官员在评论中对很多中国官员当时的态度作了这样的归纳：“这些人是决心战斗——战斗到劳苦民众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许他有点过分了，但他指出了一种阶级意识，那就是把牺牲和职责的不平等强加给老百姓，又容许利益分配的不平等。这类人的子女不分担斗争的艰苦就不足为奇了。

抗战救亡运动初期的蒋夫人

〔美〕 埃米莉·哈恩

〔抗日战争中，宋美龄投身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工作。她经常利用无线电广播、报纸杂志向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宣传中国的抗战，争取国际社会在道义和物质上给中国以支持和援助。这方面的工作是颇有成效的。

下面这段文字选录于作者的《宋氏家族》一书。她记述的是抗战初期宋美龄的有关活动和言论。〕

笔者并不想具体描写蒋介石渡江后的战事的发展。普林格尔和雷切门在所撰《中国为团结而战》一书中，对战争的初期有极好的描绘，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一段引用过来，作为宋氏家族活动记载的背景材料。

“在华北，与中国官方的谈判一直持续到7月28日，其间又发生了几起‘事件’，双方军队亦数次火并，但日本政府好像没有接受和平解决争端的意图。日本人利用第一次事件到7月28日主要军事行动开始的这段时间，调遣了大量的入侵部队和供应。然而当时许多人还真心存有疑虑，以为也许日本政府希望将战争只局限于华北，也许日本政府会认识到，战争并非是不可避免的。日本政府是否与陆、海军的意见完全一致，陆海军之间是否意见统一也是没有把握的。